



论新东亚地区主义产生的原因

张德明

摘要:新发掘的资料揭示,新东亚地区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三:战后、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地区经济和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使东亚诸国日益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联合体,为新东亚地区主义的产生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谈判的超缓慢进程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把持着提出议程的话语权,以及欧盟和北美经济集团的不断壮大,成了新东亚地区主义产生的催化剂;东亚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使东盟国家、中国和日本深刻地认识到,亚洲国家必须自己依靠自己,联合起来,才能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关键词:新东亚地区主义;原因;东盟;中国;日本

“新东亚地区主义”问题目前受到国内外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被讨论得十分热烈。讨论的内容广泛,包括东亚地区主义的概念、内涵、特点和前景;它与中国、美国、日本、东盟等的关系;它与欧洲和北美地区主义的比较等。但是,对它产生原因的研究尚显不足,只是在讨论上述问题时被涉及,在国内和国外论文数据库如《杰斯特》(JSTOR)中尚未发现专门研究该问题的论文,专著也未见到。因此,本文试图集中探讨之。

地区主义的概念有多种。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Z. Lawrence)说:“地区主义指以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遗产将它们捆在一起的功能关系,这种关系常常是以地理接近的优势为基础的。”^①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等认为:地区主义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在同一地区特定的国家集团中经济流量的增长比这些国家与位于其它地区的国家之间的快。地区内经济流量的增长可能源于经济力量,如地区内总增长率高于地区之外的,以及源于将集团成员国的贸易自由化和歧视域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②。美国前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艾伯特·费希洛(Albert Fishlow)认为:地区化指地区经济流量的集中;地区主义则指以在(同一地区)诸国间经济政策的合作与协调为特征的政治过程^③。《维基百科》的界定为:“地区主义是一种聚焦于特别地区或者地区集团的利益的政治思想意识。”

以上几种概念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地区主义的含意,本文吸取其精华,对地区主义予以界定。地区主义内容包括三点:一是地区认同,即一个国家认识到,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历史渊源关系,它和邻近诸国属同一地区,具有同样的地区特征;二是利益的认同,同一地区的国家认识到它们在发展经济、促进繁荣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三是有组织起来

① Ralph A. Cossa, et al.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7, p. 17.

② Edward D. Mansfield, et al.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9, 53(3), p. 591.

③ Edward D. Mansfield, et al.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p. 591.

的要求,即同一地区的国家为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而以制度的形式建立自己地区集团的强烈愿望和行动。所谓“新东亚地区主义”就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有着悠久历史关系的东亚国家,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们的经济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形成的客观存在的地区经济联合体,为了维护各国共同的经济利益,保持经济的繁荣和不断发展,而产生一种建立本地区经济集团的构想和所付诸的行动。

新东亚地区主义表现为一系列的标志性事件: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1997年“东盟10+3”峰会的召开(时为东盟9+3,1999年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成为东盟10+3);2002年,“东盟10+3”峰会通过了建立东亚共同体报告;2003年日本和东盟发表的《东京宣言》也确认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2005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重提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建议^①。这些事件充分说明新东亚地区主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产生呢?

一、东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密切

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东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密切是新东亚地区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

战后东亚经济奇迹不断,如日本的重新崛起、“四小龙”的腾飞、东盟的崭露头角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日本经济1955年进入高速发展期,1955—1973年经济年增长率达10%。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于六七十年代完成由农业社会或转口贸易港口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成为东亚四个新兴工业体,经济快速向前发展,1961—1994年经济年增长率分别为:8.4%,8.7%,8.3%和8.1%^②。菲律宾和泰国于1975年、马来西亚和印尼于1980年,在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工业超过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四国1975—1994年经济年增长率分别为:3.05%,7.8%,6.9%和6.3%^③。中国大陆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举世瞩目,1979—1994年经济年增长率为9.8%^④。中国成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它们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经济为外贸和投资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这些经济体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外贸的发展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进。于是,外贸和外资便成了促使区域内经济相联的两条主线。

日本长期奉行贸易立国战略,“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东盟四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在起初一段时期执行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及时转为出口导向战略,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中国造”遍及世界各地。在这些外向性经济战略的指导下东亚诸经济体外贸发展迅速,1980年至2003年的23年里,商品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6.9倍和5.9倍,而世界出口和进口都只增长3.3倍。同期,东亚在世界出进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从12.8%和13.6%升至23.5%和20.6%,而且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各经济体外贸的迅速增长大大地加强了区域内的贸易联系^⑤。1995—2005年,中日之间、中韩之间以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分别增长4倍、8倍和6倍。2003年东亚地区内贸易份额占其贸易总额达53.3%,而1980年的贸易份额只有33.6%。该数据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比例(44.5%),正在接近欧盟的比例(60.3%)^⑥。这样,纵横交错的贸易网把东亚国家连在了一起。

东亚国家中,日本一直是其它国家外资的主要来源,其余国家和地区先是外资的利用者,后成为东亚其它国家的投资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外资流入“四小龙”、东盟四国和中国大陆的数量不断上升。80年代后半期,进入“四小龙”的外资迅速增长,然后到80年代末,进入东盟四国的外资开始显著上升。最后到90年代初,进入中国大陆的外资急剧增长,并超过了进入“四小龙”、东盟四

① 日本曾经是一个“脱亚入欧”的国家,现在也仍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它赞同建立东亚共同体,说明它在地区认同上有很大的进步。

② 郑励志:《世界和亚太地区经济年实际增长率(以GDP计算)》,载《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

③ 郑励志:《世界和亚太地区经济年实际增长率(以GDP计算)》,第4页。

④ 郑励志:《世界和亚太地区经济年实际增长率(以GDP计算)》,第4页。

⑤ Shujiro Urata, “Trade, FDI-Driven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44.

⑥ Ken Jimbo, “An Emerging East Asian Community?”,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15.

国的外资。到 90 年代末,进入“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的外资继续上升,而流入东盟四国的外资开始下降^①。日本是区域内的主要投资者,到 70 年代,它作为东北亚和东南亚最重要的投资者已开始超过美国。到 70 年代前半期,它对韩国的直接投资相当于美国的 4 倍。从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日本的公司对东亚地区的投资继续以稳定的比例上升。然后,在 80 年代后半期,日本遍布于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以更快的速度上升。1985 年 9 月《广场协定》的结果是该协定通过重要的 G-5 央行增加了日元对美元的比值,扭转了美国对日本贸易不断上升的赤字:日元值从 1985 年 238 日元兑 1 美元升至 1988 年的 128 日元兑 1 美元。这促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将它们的作业移往海外以降低成本。开始,中国台湾、韩国是日本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随着台币和韩国货币的升值,东南亚对日本的吸引力上升。80 年代由于大量的日本官方开发援助之故,以日本为基地的投资者进入中国和东南亚的越来越多。日本公司向韩国和中国台湾,并且最后向东南亚和中国的扩展,是与日本产业结构方面的区域化的不断努力(虽然很不平衡)相联系的^②。“四小龙”在拥有剩余资本后也向东盟和中国大陆投资,东盟国家的华裔向中国台湾和大陆投资,发展起来的中国大陆也向东亚其它经济体投资。南来北往的投资线将东亚国家绑在一块。

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而形成的两者之间的“连结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东亚的区域化程度。引进外资的东亚国家能从外资中得到各种利益,而这些利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外资为东亚国家所缺少的固定投资、技术和管理技能带来了各种资金。此外,外资能使外资接受国利用主要的外国投资者——跨国公司的销售和采购网络,导致进出口贸易的扩张。出口扩张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因为它能使出口国赚取更多的外汇,这些外汇又能用于进口技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和其它项目以使经济进一步增长。成功的出口表现又反过来导致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资的吸引。通过这种方式,“贸易—投资连结”在东亚形成,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增加,即加深了区域化的程度^③。

投资和贸易的发展导致东亚出现一个地区性生产和销售网络。跨国公司将生产程序分为若干子程序,并将各子程序安置在生产该子程序效率最佳的国家或地区^④。这种被在电子、运输和精密机器及纺织等部门里的许多跨国公司所采用的程序之间的劳动分工战略增加了跨国公司所从事的区域内贸易。这样,对于日本的跨国公司的东亚分支机构而言,越来越多的分支机构之间的交易采取了公司内贸易的形式。公司内交易占整个交易的比重 1992—2001 年间急剧上升。1992 年,就分支机构与母国日本的贸易而言,公司内的贸易是主要的,表明子公司与在日本的母公司之间强劲的关系。可是到 2001 年,不仅在子公司与母国的贸易方面,而且在它们与东道国的贸易以及它们与外国的贸易方面,公司内的贸易已占很大部分。这种日本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所从事的公司内贸易的增长似乎说明与日本相关的地区生产网络的出现,由于子公司数量的增加和它们活动的扩大使地区生产网络的出现成为可能^⑤。美国等其它跨国公司对东亚地区性生产和销售网络的出现也起着同日本跨国公司类似的作用。

总之,既以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为前提,又是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的外贸和投资成为发展该地区经济联系的两根主线:贸易和投资本身就形成了将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贸易与投资之间的连结关系加深了东亚的区域化程度;投资和贸易在跨国公司的作用下使东亚地区出现了生产网络。一句话: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东亚诸国正在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联合体。东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密切为新东亚地区主义的产生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① Shujiro Urata, “Trade, FDI-Driven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47.

② Mark T. Berger, “APEC and Its Enemies: the Failure of the New Reg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9, 20(5), pp. 1021~1022.

③ Shujiro Urata, “Trade, FDI-Driven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p. 42~43.

④ 以生产个人电脑为例,个人电脑的生产程序被分为设计、零件生产、终端产品组装。一个典型的日本个人电脑生产商在日本进行设计,把零件生产安置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如硬盘在菲律宾,中央处理器在美国,内存存在韩国,晶体液晶显示器在中国台湾),从这些地方进口零件入中国进行最后组装。

⑤ Shujiro Urata, “Trade, FDI-Driven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51.

二、国际因素的挑战

国际因素的挑战是促成新东亚地区主义产生的第二个原因。

国际因素之一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进程一波三折、极其缓慢,以及贸易谈判中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被忽视。这主要表现为几次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的多次会议、西雅图会议和多哈回合的坎昆会议。

自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签署至80年代初,关贸总协定进行了7次谈判,大大降低了缔约国的关税,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从7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以政府补贴、双边数量限制、市场瓜分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为特征的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为了遏制贸易保护主义,1986年9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的缔约国部长级特别会议决定再发起一次多边贸易谈判。这第8次谈判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除继续解决传统的关税问题外,还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但谈判长期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多次陷入僵局:1988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谈判无进展,直至1989年4月谈判在日内瓦重启,预计在1990年12月在布鲁塞尔开会时结束,但因在改革农产品贸易上意见不一,决定将该回合延期。乌拉圭回合进入了最无希望的时期,达一年之久,直到1991年12月日内瓦会议时《最后条例》(“Final Act”)草案才出炉。但在随后的两年中,谈判艰难,最后期限多次变更,除了农业之外新的冲突点包括:劳务、市场准入、反倾销规定等。美国与欧盟的分歧成为谈判成功的主要障碍。直至1993年12月15日,所有问题才获最后解决。1994年4月15日,123个参与国的绝大部分部长签署了最后协定。原计划4年的乌拉圭回合经历了漫长的7年半时间,其原因无非二条:一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不愿意作出让步;二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

1994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继续推动国际多边贸易谈判。在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即西雅图会议上,根据乌拉圭回合的协议,准备开始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但会议一开始就遇到困难:会场外,美国工会等组织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企图影响会议议程,开幕式被迫取消。会场内,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企业欲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等问题纳入谈判议题,遭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结果,新一轮谈判未能启动。会议的失败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失败,1999年12月11—17日《经济学家》杂志的封面设计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标题《在西雅图的真正输家》之下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穷孩子的照片。西雅图会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贸易上的利益冲突。尽管乌拉圭回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农产品、劳务、投资和知识产权方面朝着贸易自由化目标的推进仍处于初始的阶段。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没有从贸易自由化中享受到在乌拉圭回合期间它们被许诺的那样多的好处,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仍受严密保护的服装、纺织品和农产品方面。它们还感到:一旦它们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它们经常遭受反倾销的厄运。对于它们来讲,在与反倾销行动的斗争中,最好的结果是成本高昂;最坏的结果是产品被拒于发达国家的市场之外^①。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农业经济教授卡尔·米尔克指出:事实上,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和速度的分歧在欧盟、日本和主要的农产品国家之间是根深蒂固的^②。此外,发展中国家担心:发达国家将利用严厉的环境污染和劳工规定作为保护主义的面纱^③。

多哈回合的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2003年9月10—14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分歧严重,会议无果而终。一是“新加坡议题”。该议题包括四项内容:跨国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政府采购,于1996年在新加坡首次提出,故得名。与会者对究竟是否要就此议题展开谈判,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发展中国家特别质疑议题中的跨国投资新办法,担心新办法可能有利于外国企业,而牺牲本国的产业,因而反对。二是农业补贴议题。发展中国家坚持取消发达国家补贴农民的作法。欧盟虽同意取消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特殊利益的农业补贴,但拒绝在某一特定期限前

①Karl D. Meilke. “What Went Wrong in Seattle?”, *CATRN Paper*, January 2000, p. 3.

②Karl D. Meilke. “What Went Wrong in Seattle?”, p. 1.

③Karl D. Meilke. “What Went Wrong in Seattle?”, p. 3.

取消所有补贴。美国同意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但同时也要求对方让步。矛盾的焦点是:以印度、巴西、中国为首的 21 国要求欧盟、美国等发达成员定出取消高额农产品出口补贴的时间表,同时削减国内支持;发达成员国则要求发展中成员国进一步开放市场。13 日出台的《部长宣言草案》与此前欧美的建议如出一辙,尽管要求各个成员国取消农业出口补贴,但却并没有规定取消补贴的具体时间,这就为发达成员国留下回旋的余地。上述 21 国则要求发达成员承诺取消农产品补贴的最后期限。非洲国家的代表团成员在会后的记者会上称,自己完全被该草案的不公正性震惊了。很清楚,问题的关键是发达国家在削减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问题上不肯做出实质性让步。

乌拉圭回合中的多次挫折、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以及坎昆会议的无果,使东亚发展中国家一次又一次清楚地认识到: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制作仍然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把持,它们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制定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声音简直太微弱了,包括东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想办法加强自己在国际贸易组织中的话语权。

国际因素之二是欧美地区主义的成长。战后世界第一次地区主义浪潮首先在欧洲出现。欧洲的地区主义起源于 1951 年法、意、西德等 6 国签订的《煤钢共同体条约》,到 1957 年 6 国又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即《罗马条约》,这是欧洲地区主义产生的标志。1965 年 6 国签订了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的《布鲁塞尔条约》,欧洲共同体诞生,这是欧洲地区主义成长壮大的重要里程碑。1991 年,欧共体通过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 年欧共体更名为欧盟。从 1965 至 2004 年,欧共体和欧盟共扩大了 5 次,成员国从 6 个增至 25 个,囊括了西欧、中欧和东欧的国家。第五次扩大后的欧盟人口约 4.55 亿;整体国内生产总值 10 万多亿美元,欧盟的整体实力将大大提高,向实现强大和统一欧洲的目标又跨出巨大一步。世界第二次地区主义浪潮开始于 80 年代中期。1985 年,加拿大和美国首次正式提出两国加强经济合作、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1988 年,双方正式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接着,美国与墨西哥谈判类似条约。两国于 1990 年正式达成了美墨贸易与投资协定。同年 9 月,加拿大宣布将参与谈判。恰逢 1991 年欧共体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此背景下,美、加、墨于 1992 年达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 1994 年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美国甚至提出将北美自由贸易区扩大为全美洲(除古巴之外)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并于 2003 年召集 34 个美洲国家讨论该计划。

欧盟的成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继续扩大的趋势对东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首先,由于两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各自区域内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越来越大^①,区域外贸易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越来越小,这意味着东亚国家对欧美贸易的相对减少。其次,两大区域内实行自由贸易,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为零关税,而东亚国家与欧美之间的贸易有关税壁垒,这对东亚国家来说,欧洲、北美就成了两个相对关闭的国际市场,这就更不利于它们的外贸了。再次,因为欧美两大区域都组成了经济集团,它们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中就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发言权,而一盘散沙的东亚国家的声音相对而言就更微弱了。最后,单个的东亚国家面临强大的欧盟和北美,在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

国际多边贸易谈判状况和欧洲、北美地区主义的壮大使东亚国家开始觉悟了,它们萌发了建立本地区经济集团的想法。这里仅举两例。

一例是东南亚国家的言行。典型的行动是建立“东亚经济集团”设想的提出。正当 1990 年 12 月布鲁塞尔会议之后乌拉圭回合谈判进入最无希望的时候,时为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首次提出由东盟六国(印尼、马、菲、新、泰、文莱)和中、日、韩三国共同组成“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n Economic Bloc)的建议。马哈蒂尔为什么要提出这一建议呢?2004 年当他被采访问及这一问题时,他回答道:“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关贸总协定回合还没有正式启动,那些强国不想做对弱国有益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并形成了欧盟,这是件很大的事情。在北美,我们看到美国、加拿大和墨

①到 2003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的区域内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率为 44.5%,欧盟的这一比率为 60.3%。

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所以,东亚国家也应该建立自己的经济联合体,这样才可以和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抗衡,所以我建议我们要建立东亚经济联合体。这会对世界经济作出很多贡献,当然包括东亚经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讨论我们各国的进口问题……世贸组织的议程大部分是由西方国家提出的,这些议程非常片面,他们好像不太考虑其它国家的利益,包括东亚国家。所以,形成这样一种联合体,我们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中的声音就会变得更强大……我们还应该提出自己的议程,充分考虑穷国的利益。”这里,马哈蒂尔吐露了他倡议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动机。他认识到:鉴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贸易改革进程缓慢,出台议程的话语权掌握在强国手中,它们又不顾弱国的利益,以及成功的欧盟和正在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影响日益增强,弱势的东亚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在经济上联合起来,才能与欧盟和北美竞争,才能在国际贸易组织里争得更大的发言权,才能对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是菲律宾(美国的盟友)人的讲话。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Fidel V. Ramos)2002年3月7日在吉隆坡“亚洲经济峰会”上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东亚经济集团?”因为“只有组成一个东亚集团,‘东盟+3’才能产生足够的优势迫使他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贸易伙伴与他们实现互惠。只有东亚站在一起才能说服富国取消它们给予其农民的巨大出口补贴,允许发展中国家的食品、纺织品和其它劳动密集型出口品更自由地进入它们的市场。只有一个东亚经济集团才能在知识产权、以及环境、劳工和人权等问题上按世贸组织的议程权威性地为所有穷国说话。”

另一例是日本的举措。日本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那里得到了启发。日本通产省的《1999年国际贸易白皮书》主张建立一个东北亚贸易集团,并推荐道:“日本应该寻求在东北亚加深区域内的交流和理解,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在地区结合或一体化上显示出没有兴趣的国家。日本应该以更大的热情致力于推进地区结合,并给予世界提供一种对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做出积极贡献的模式。”^①通产省为什么建议日本“以更大的热情致力于推进地区结合”呢?这是因为,在若干重要方面,世贸组织的多边谈判直接为地区协定所决定,即现存的地区协定已经为多边协定的某些部分构成了谈判的基础。例如,1996年世贸组织在新加坡所通过的信息技术协定就是建立在几个月之前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美国的压力下所通过的类似协定的基础之上的。许多命运多舛的世贸组织的《多边投资协定》的条款渊源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11章。因此,地区协定越来越被用于作为世贸组织多边谈判的参照。这样的议程设置机制使美国和欧洲明显受益,在参与讨论世贸组织多边协定时,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将自己现存地区协定作为蓝本而引用。日本没有,结果发现自己在其他人所选择的依据上进行讨论^②。因此,日本必须建立自己地区贸易安排“模式”,即地区经济集团,以便在参与世贸组织多边谈判时引用。日本起初只想建立东北亚地区经济集团,后发展到支持建立包括整个东亚在内的东亚共同体。促使日本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另一个原因是加强与区外经济集团经济关系的需要。2000年,通产省分析指出:“近来,对在传统的地区框架之外的贸易自由化的兴趣出现了,即地区集团之间的联系加强。例子包括计划将美国和拉丁美洲联在一起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在墨西哥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行动,以及在墨西哥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上达成一致。这种新趋势背后的因素如下:1)通过建立传统地区集团之外的框架来一步促进自由贸易自由化;2)促进进入区域外市场;3)希望加强对其他地区集团的影响和与它们的谈判力。”^③日本如果要像美国和欧盟那样与东亚地区之外的地区集团打交道,没有自己的地区集团为后盾是根本不行的。因此,日本希望建立东亚经济集团。

三、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

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新东亚地区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三。危机于1997年7月从泰

① Paul Bowles. "Asia's Post-Crisis Regionalism: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Keep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2, 9(2), p. 246.

② Paul Bowles. "Asia's Post-Crisis Regionalism: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Keep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p. 247.

③ Paul Bowles. "Asia's Post-Crisis Regionalism: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Keep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p. 247.

国开始,随后席卷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印尼、韩国和泰国受灾最严重;香港、老挝、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被波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受影响较轻;处于长期经济困境中的日本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东亚国家损失惨重,东亚经济发生大倒退。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态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给亚洲国家以深刻的教训。

危机爆发后,东亚国家对美国寄予厚望,但美国的态度却使它们大失所望。

首先,美国态度冷漠,行动迟缓。危机爆发后的三个月里,它“隔岸观火”,没有行动,直到危机爆发五个月之后,才有较积极的援助活动。但它不愿意带头拿出巨额资金支持东南亚国家,只同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多边援助。韩国、泰国曾向美国政府求助,均遭到拒绝。可是,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曾立即连续提供总金额达400亿美元的援助,对墨西哥在短期内克服危机起了关键作用。这说明,美国对墨西哥与对东亚国家是亲疏分明的。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西蒙·泰指出:“在东亚一些人的感觉是,美国能够而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例如,在泰国和韩国(两者都是美国的盟友),人们从1994年当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邻国墨西哥遭受金融危机打击时美国所给予的援助数额得出了负面的比较。”^①

其次,美国政府放任在东亚的美国金融投机者。“国际金融投机者大举狙击是诱发泰国货币危机的直接根源之一。”^②如果投机行为能被及时遏止,危机将会得以缓解。马哈蒂尔不断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对付投机者,但美国政府置若罔闻。1997年7月底,当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询问有关马哈蒂尔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对付涉嫌在东南亚货币市场兴风作浪的大炒家索罗斯时,美国副国务卿艾森斯塔却回答道:“若以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在货币市场上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③言下之意,他不认为投机能够搞乱东南亚金融市场。美国为什么不愿约束投机者呢?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文鸿认为:这可能涉及到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可能打乱东亚地区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挑战。如果金融风暴持续下去,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奇迹很可能被葬送掉^④。也就是说,东亚金融危机的发展和持续是符合美国的东亚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所以美国政府对在东亚的金融投机者听之任之。

再次,美国扼杀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主张。为了援助东亚邻国、乘机担当起亚洲领导者的角色,日本于1997年9月10日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基金总额1000亿美元,日本出资一半,中、韩和东盟10国也参加出资。该建议立即遭到美国的反对。美国采取种种措施扼杀了这一提议。美国为什么不允许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呢?因为该基金的成立意味着美国在东亚金融事务中主导地位的严重削弱甚至丧失。亚洲货币基金的灵魂是日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灵魂是美国。亚洲货币基金被否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即美国在处理东亚金融危机中主导地位就是无可争议的了。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动机不纯、效果差劲。该组织所采取的政策目的之一在于打开遭受危机的国家经济之门,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该组织提供的贷款带有苛刻的附加条件,以此方式迫使受援国取消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保险业等,从而打开遭受危机的国家经济之门,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该组织对韩、泰、菲和印尼等国都有这样的要求,因此,东亚国家失望之极。同时,该组织对东亚金融危机开错了药方,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不仅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使遭受危机国家的经济情况更糟糕。未接受该组织援助的马来西亚的经济恢复反而还快些。保罗·克鲁格曼等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许多疗法是无效的,或者的确是产生相反效果的^⑤。亚洲地区的普遍感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以损害亚洲工人和亚洲国家的主权为代价为保护西方借贷机构的利益和为西方公司打开亚洲市场而行动^⑥。东亚金融危机给

① Simon S. C. Tay,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View from ASEAN”,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178.

② 何秉孟:《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③ 陈文鸿:《东亚经济何处去——'97年东亚金融风暴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200~201页。

④ 陈文鸿:《东亚经济何处去——'97年东亚金融风暴的回顾与展望》,第203页。

⑤ Simon S. C. Tay,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View from ASEAN”, p. 178.

⑥ Paul Bowles, “Asia's Post-Crisis Regionalism: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Keep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p. 238.

东亚国家的教训是:美国不可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靠不住,东亚国家在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时,只有靠自己。

正是因为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袖手旁观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明显滞后,东亚国家感觉到有组织起来共同对付金融危机的必要。于是,1997年年底,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东盟10+3”实质上是马哈蒂尔建议的“东亚经济集团”的延续和发展。“东盟10+3”机制下设有两个民间非政府组织“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n Vision Group-EAVG)和“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n Studies Group-EASG),前者对该机制未来发展起咨询作用,后者特别对推进东亚合作的具体领域和可以采取的措施进行研究。“东盟10+3”机制的形成是东亚国家吸取东亚金融危机所给予的深刻教训的结果,是通向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对东亚国家贷款所附加的苛刻条件以及援助所产生的副作用使它们认识到,必须建立本地区的货币基金以对付以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和避免受制于人。为此,尽管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被美国否决,但东亚国家继续为建立本地区的货币基金而努力。1998年10月,日本提出“新宫泽计划”(New Miyazawa Initiative),为东亚提供300亿美元的援助基金,其中一半用于东亚国家经济恢复之中长期所需,另一半用于它们经济改革之短期资本需求。同时,在该计划中,日本通过资金优势主导区域货币合作之心开始有所收敛。计划受到东亚国家的欢迎。在新宫泽计划提出前后,马哈蒂尔也在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协商,提出在区域贸易中以本地货币取代美元作为清算手段的初步设想,以便逐步减少东亚对美元的依赖,缓解货币危机中资本大量流出造成的贬值压力,并且触及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对东亚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1999年10月,马哈蒂尔再次建议设立东亚货币基金,东亚各国也通过“东盟10+3”机制等各种论坛积极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东亚金融合作进程在东盟国家的推动下开始加速并且逐渐成为一种区域共识。2000年5月,“东盟10+3”财长就开展东亚金融合作的具体内容及形式进行磋商,在原来的东盟货币安排互换(Asian Swap Arrangement)框架下提出建立东盟成员与中日韩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Network of Bilateral Swap and Repurchase Agreements),并在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下达成《清迈协议》,允许随时以增发的本国货币作为担保进行货币互换。结果,一个旨在使亚洲国家能够对付任何未来货币危机而不需要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区外币互换网络获一致同意。这一发展,即该地区中央银行间的合作,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亚洲货币基金,为达到亚洲货币基金的目的提供了机制,但又避免了建立一个可能遭美国反对的正式机构所造成的困境。东亚有了以“东盟10+3”国家的共同储备超过8000亿美元(超过欧元区国家集体储备的2倍和美国的10倍)的资源来为这一创举提供资金^①。

东亚金融危机还使中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认识得以升华。在危机中,中国从大局出发,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力支持东亚其它国家克服金融危机。它主要采取两项重要措施:一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计划向泰国和印尼提供45亿美元的援助;二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当日本放任日元贬值以便向别国转嫁危机、美国也对日益贬值的日元不予干涉以便以高估的美元来整批收购东亚企业的时候,中国仍恪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可见,中国为支援东亚国家和稳定东亚金融局势做出了重要贡献和自我牺牲。但是,美国对中国所起的重要作用视而不见。一位学者指出:“在美国解决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战略中,它没有充分承认中国的重要性。去年(1997年)11月24日,在温哥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了解决危机的三点计划,但是他忽视了未受危机影响的中国的作用。”^②1998年6月,日元对美元比值下滑到几年来的最低点,出现了对新一轮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担心。正是在这个月,克林顿正式访华,中国至少希望在自己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上有所突破,但直至同年12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美国在世贸组织问题上仍未对中国让步。面对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不顾克制危机的大局,对在援助东亚国家中起重要作用的中国不仅不支持,反而极尽打压之能事。这使中国认识到,中国和东亚其它

① Paul Bowles, "Asia's Post-Crisis Regionalism: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Keep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pp. 239~240.

② Paul Bowles, "Asia's Post-Crisis Regionalism: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Keep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p. 242.

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受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歧视,只有和东亚其它发展中国家合作才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争得平等的地位。关于 2000 年 5 月达成的《清迈协议》,14 日的中国《经济日报》英文版中写道:“在过去,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北美和欧洲相较,亚洲的经济合作在过去十年内落后了。亚太经合组织这一地区性组织只不过是个论坛,它缺乏约束力。然而,三年前蹂躏该地区的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认识到合作共事的迫切需要。许多亚洲国家对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仍有着痛苦的记忆……日本、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外汇储备共有 8000 亿美元,这些货币如果管理得当,肯定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①而对 1997 年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中国并没有给予支持,一则因考虑到在当时东亚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下,如果成立亚洲货币基金,日本必在其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从而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并会主导该基金的运作;二则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认识还欠深刻。到 2000 年 5 月,中国积极支持《清迈协议》,除了日本通过资金优势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色彩大大淡化了和其合作态度更诚恳外,东亚金融危机使中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认识提高了是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导致新东亚地区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密切成为地区主义产生的肥沃土壤。战后东亚经济奇迹中的外贸和投资这两条线将东亚国家联在一起,两者之间的连结关系又加深了东亚的区域化程度。跨国公司利用贸易和投资使东亚地区出现了生产网络。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东亚诸国日益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联合体。这为东亚地区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二是国际因素的影响。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谈判的超缓慢进程和在其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议程出台话语权的把持,严重地耽误和损害了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欧盟和北美经济集团的不断壮大使一盘散沙的东亚国家处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这两种因素成了东亚地区主义产生的催化剂。在其作用下,马哈蒂尔首次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建议;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阐述了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理由;日本通产省萌发了构建东北亚乃至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想法。三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在东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时,美国起初拒绝援助,并放任金融大炒家的投机行为和扼杀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目的不纯,效果不好。这些使东亚国家深刻地认识到:为了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亚洲国家必须联合起来,自己依靠自己。于是,它们及时成立了“东盟 10+3”机制,通过了“新宫泽计划”,达成了《清迈协议》。金融危机中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使中国深化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认识,使中国进一步与东亚国家融为一体。东亚经济联合体的客观形成、两大国际因素的影响以及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三种因素促进了新东亚地区主义的产生,东亚国家达成了共识,一致赞同建立自己的地区经济集团——“东亚共同体”。

● 作者简介:张德明,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Paul Bowles, "Asia's Post-Crisis Regionalism: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Keep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p. 244.